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基本经验及其当代启示*

吴荣军

[摘要]1949—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在主流意识形态构建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果,形成了三项基本性的经验: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的三者统一;二是系统批判旧中国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深入清除其历史影响;三是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思想功能,从而在实践运用中巩固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历久而弥新,既构成了新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工程的奠基之石,又构成了社会转型期意识形态工作方法的源头活水,迄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主流意识形态构建;马克思主义;基本经验;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7)11-0083-06

在当前的意识形态工作中,深入挖掘、梳理、借鉴和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的相关经验,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7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空前深刻变革的时期,结束了长达10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而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我们党在这一时期创造了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途径方法,奠定了新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工程的科学基础,包含着适用于重大社会变革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普遍经验,从而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国家软实力等工作的源头活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主流意识形态构建基本经验之一: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和宣传的三者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题和中心是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非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首创精神成功运用于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大普及大繁荣,为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与促进作用。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首要经验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和宣传的三者统一。

为了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为新生政权树立起鲜明的思想旗帜,1950—1951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这场运动起始于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组织学习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毛泽东在1950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1](p.74)}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这次学习采用的主要教材是恩格斯的

*本文系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建国初期(1949—1956)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及其历史经验研究”[17YJA71003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吴荣军,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

《从猿到人》(于光远翻译)和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这次学习运动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一贯原则,尤其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其中,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亲力亲为是一大特点。例如,1951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为京津冀地区几十所高等院校的教师做了长达5个小时的报告,恳切地介绍了自己学习和改造思想的经验,带动各级政府加强了对知识分子学习的有效领导。^{[2]p.6)}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活动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成果有机衔接,是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构建工作的又一着力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知识内容学习向思维能力提升的转化,越来越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为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在《毛泽东选集》出版之前,先在报纸杂志上重新发表毛泽东以中国语言、中国风格创造性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哲学著作《实践论》(1937年7月首次发表)、《矛盾论》(1937年8月首次发表)。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首先重新发表了《实践论》;1952年4月1日,又重新发表了《矛盾论》。毛泽东“哲学两论”的重新发表,促成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思想界掀起研究阐释热潮,出版了一系列迄今仍有参考价值的专著,如李琪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浅说》、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沈志远的《〈实践论〉解说》、顾荣实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学习提纲》等。应特别强调的是,广大学者把研究阐释与补充发挥相结合,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本性与实践本性。例如,李达在《〈矛盾论〉解说》中不仅诠释了对立统一规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运用问题,而且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了前瞻性探索,提出应“及时地改进落后的社会关系使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3]p.220)}的正确主张。

为了更好地保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宣传部门建设也同时展开。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出版工作,首先于1950年底成立了人民出版社,主要任务是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著作。1953年1月,又成立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专门负责领导和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与出版机构的蓬勃发展相呼应,中国学者也先后撰写出了一批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著作,特别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整体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著作,代表性的有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和冯定的《平凡的真理》等。这些宣传性著作的特点,一是继承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等文献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化的思路,从而为群众开展学习提供了较为严密的思想体系,例如《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以认识论为中心规划哲学原理的知识架构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最重要的哲学普及读本;二是注重理论宣传的大众化与现实针对性,例如《平凡的真理》旨在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旨在帮助读者掌握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倾向;^{[4]p.98)}三是自觉将宣传工作与研究工作有机结合,初步提出了一些带有探索争鸣性质的学术课题,如杨献珍提出的思维与存在“一致”与“同一”的差异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从而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与思想活力。总之,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和宣传的三者统一,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主流意识形态构建最基本的经验,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主流意识形态构建基本经验之二:批判和清除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国哲学强调“不破不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思想战线上,与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步进行从而相辅相

成的,是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和清除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包括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批判中国现代哲学家和史学家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清除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的消极影响三个方面。这些活动以论战的形式展开,为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思想舞台上的主旋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科学地预见到,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5](p.36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反映剥削阶级利益的旧思想和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广泛存在着,尤其表现为文艺思想上的封建主义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6](p.695)}为了清除这些旧思想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批判活动,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对电影《武训传》和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0年底和1951年初,全国各大城市上映了电影《武训传》,获得了广泛好评。这部电影受到赞誉,是与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及其所确定的党在思想战线的任务相违背的。1951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社论,尖锐地批判《武训传》所表现出的错误思想,即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对反动的封建统治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7]1954年10月起,文艺界又展开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规模批判,批评俞平伯“钗黛合一”“自传说”“色空说”抹煞了《红楼梦》作者鲜明的反封建倾向。^[8]需要反思的是,这场运动由学术讨论开始,演变成一场政治思想大批判;它对于肃清文艺界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倾向起过积极作用,但混淆了学术思想问题与政治立场

问题的界限。1956年5月,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指出,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俞平伯进行的政治性围攻是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采取的“双百”方针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艺思想上的批判活动,对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镜鉴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哲学家和史学家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自唯心主义流派的旧式教育,因此批判其唯心史观就成为另一项紧迫的任务。解放以前,胡适的实用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最大的思想流派,在中国思想界具有广泛影响,因此,清除实用主义就成为当时思想理论战线上一个重要目标。1954年12月,中国科学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内容包括胡适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文学史观批判等九个方面,形成了一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最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与这场运动同时进行的还有文化学术界对梁漱溟唯心主义哲学和历史观的批判。1953年,梁漱溟针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对政府的农村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谈到农民生活没有改善甚至产生了“九天九地”的差别。毛泽东在政协会议等场合严厉批评了梁漱溟,进而发起了又一场大型批判运动。其间,冯友兰撰文批评梁漱溟的“村治”理论是封建复古主义,是在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9]这一时期,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自己以往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进行了自我批判,进而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当然,与前述文艺思想批判运动相似,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哲学家、史学家相互间的批评以及自我批评,也存在着屈从于政治压力而刻意为之的问题,^[10]因此也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应予反思的课题。

上述国内学者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形成,与其在早期所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学术侵染密不可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旧中国,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陆续传了进来,但这种传播是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们自觉引入借鉴西方学术大不相同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社会契约论、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意志主义、伯格森主义等,凭借半殖民地经济政治体制的支撑掩护,在旧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有着很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改造运动不断深入发展,以及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清算,理论界相应地展开了对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系统批判。例如,1951年4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集体撰写的论文《从西方哲学认识论的批判来学习〈实践论〉》,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中唯理论和经验论两大派别的错误,指明19世纪和20世纪的实证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等流派都属于唯心主义经验论的范围,特别说明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工具。^[11]再如,任华的《批判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服务的语义哲学》一文提出,语义哲学企图用语言的形式烦琐讨论来诱导人民脱离现实斗争,并为帝国主义的政策和行为辩护。^[12]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论著对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展开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对认清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笼统化、泛政治化的时代局限性,需要我们在今天慎思明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主流意识形态构建基本经验之三:在实践运用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事实胜于雄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向人类解放的革命学说,其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改造世界的实践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p.136)}如果说前述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经验侧重于理论建树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问题并取得新的伟大成就,则在实践方面彰显了这一学说的先进性,从而用更加令人信服的经验事实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其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阶级分析、矛盾分析方法,根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正确地制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和策略,体现了思想文化革命为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服务的思想,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完成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在一份批语中指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14](p.292)}这就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状况出发,科学地揭示了新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这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优先解决主要矛盾以带动其他矛盾解决的方法,在新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不要四面出击》一文,原是毛泽东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这部分讲话在全面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精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略方针和路线。在这一正确方针路线指导下,党带领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以及“三反”“五反”等大规模运动,仅用两年多时间就胜利完成了土改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任务,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其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矛盾运动的学说,在准确把握国内主要矛盾转化时机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适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随着镇压反革命等初期任务的顺利完成,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从而准确地把握到了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21](p.52)}1952年下

半年,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即将结束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贯彻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总路线规定要对三大产业部门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贯彻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原理。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规律,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理论基础;对这一规律的准确把握和科学运用,则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艺术。

其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抓住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这一唯物辩证法精髓,开创了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变,从而用大量新经验、新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新中国自1953年起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比如,在和平赎买政策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13](p.421)}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的阶级结构条件相结合,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通过和平赎买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设想在新中国第一次变成了现实。显然,这种以成功实践的方式所彰显出的科学理论光芒,正如马克思常引喻的“以太”,将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整个意识形态舞台上的“第一提琴”地位,^[15]从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又一基本经验。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经验的当代启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加强我国社会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就是历史当中特别是历史的重大变革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经验。上述所总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主流意识形态构建中的三条基本经验,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历史和思想财富,对于当前和今后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启示意义。

首先,要一如既往地保持中国共产党良好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并带动教育界、学术界、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的三者统一。^[16]一是要引导社会各界加强原理学习,夯实基本功。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17]二是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界加强研究,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僵化的教条、不是宗派主义学说,必须不断与时俱进、在发展中体现自身的真理力量,从而赢得干部群众的真诚信仰和自觉拥护。三是要引导舆论部门加强宣传,扩大普及率和影响力。习近平秉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力亲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先后两次组织中央政治局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集体学习;2017年,即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之际,习近平又重推这“哲学两论”、要求党员干部“反复细读”,从而促成了全国各地机关和群众重读“两论”,加强理论武装的热潮。

其次,要坚决回击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回应和驳斥各种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错误思潮。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近70年,但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亡我之行一刻没有停止过;军事

手段失败后,他们把希望主要寄托在了和平演变上。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18]就目前阶段的意识形态斗争态势而言,以下几个方面应成为工作重点:一是守护好教育、学术、宣传的主阵地,确保文化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尤其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工作者的政治观念,确保“三尺讲台无杂音”。二是要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政治勇气和真诚行动,医治党政机关自身顽疾,加强民主监督,提高立法、行政和司法的科学性及透明度,用实际行动向人民群众展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宗旨意识和政治理想。三是要立足国际互联网这一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加强自媒体舆论管控、开发自媒体舆论平台,针对“宪政民主”“军队非党化”、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消费主义、价值观层面的后现代主义等错误或消极思潮进行有力驳斥。四是要以法治手段保持好理论争鸣的必要界限,防止“左”的阴魂借机重现,保护好广大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正当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

再次,要在实践当中运用、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使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党和人民的政治信仰,更成为有效处理现实问题的科学武器。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19]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全力冲刺、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力迈进的时代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运用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所提出和运用的各种哲学、科学思维,则是以实践方式加强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时代典范。例如,“系统思维”对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原理的践履、“创新思维”对发展原理的践履、“辩证思维”对矛盾原理的践履、“底线思维”对质量互变规律的践履;又如,“战略思维”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

矛盾运动规律的践履、“法治思维”对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于经济基础规律的践履,等等。总之,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经验向我们昭示: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源于其与实践的不断对话,而在实践运用当中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则是我们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形式。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任俊明,安起民主编.中国当代哲学史(1949—1999)(上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3]李达.《矛盾论》解说[M].北京:三联书店,1953.
- [4]杨献珍.什么是唯物主义?——1955年9月讲课初稿[M].杭州: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宣传部翻印,1955.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N].人民日报,1951-05-20.
- [8]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J].文史哲,1954,(9).
- [9]冯友兰.批评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N].人民日报,1955-05-11.
- [10]桂森林,孔扬.马克思人的发展三形态思想的两种表述——理解马克思前后期思想关系的重要线索[J].长白学刊,2017,(5).
- [11]北京大学哲学系.从西方哲学认识论的批判来学习《实践论》[J].新建设,1951,(1).
- [12]任华.批判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服务的语义哲学[J].哲学研究,1955,(2).
-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 [15]孔扬,姜大云.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本论》文明观阐释重心的历史性波动[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2).
- [16]胡春阳.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探究[J].长白学刊,2017,(1).
- [1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N].人民日报,2013-12-05.
- [18]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3-08-20.
- [1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人民日报,2015-01-24.

责任编辑:涵 林

vitality. We should further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olve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guiding power, and ensure the direc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Efforts should also be made to promote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services”, solve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sharing and general preferences, strengthe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foundation, and form a firm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strategic synerg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nfidence in our path, theories and system. (Wang Yong-you and Ning You-jin)

Advocating Working is the Cornerston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a socialist society, working represents both an economic category and a moral category. Working is honorable and the other way round. Working is a virtue, while labor education is also a kind of moral education. Theoretically explaining such a seemingly simple truth deserv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e can find the context of and answers to the issue from the socialist intellectual history. Utopian socialists first suggested that work should be an honorable career. Marx and Engels lai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working as a virtue. The honor of working, an importa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of the society development for human beings, affirms and praises highly the role, dignity, and value of working and worke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m, it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socialist moral construction, or cultural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the belief that working is the most honorable and that workers are the greatest. President Xi Jin-ping stresses repeatedly disseminating the spirit of labor and model workers and opposes all unearned mind, which basically equals a fundamental project for integrating the people’s mindset and building up China’s strength. (Zhu Lei and Sun Jie-yuan)

A Critical Review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heory: An Instance of Daniel Bell’s Thoughts of “Social Prediction”: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houghts, represented by Daniel Bell’s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ry to ensure the world a future society beyond ideology, namely “post-industrial society” with the objectivity, neutrality, scientificn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rational knowledge. However, in fact, “post-industrial social theory” has completely repudiated the future of socialist society with its imagined vision. The unreal “blind optimism” and “scientism” mask the real existence of cruel class struggle and numerous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its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egated Marxism and the profound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Although “post-industrial social theory” is known as “transcending” or “ending” ideology, it is regrettable that its essence is still a bourgeois ideology. (Li Xue-y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Should Start with Mao Zedong’s Philosophy: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should start with Mao Zedong’s philosophy, since his thoughts are a China-based, reality-oriented, and innovative philosophy with a world vision. Nowadays, discussing the tren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is inclined to be confined to Chinese, 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y. They could hardly guide China’s practice before their authentic localization. The great times produce great theories, as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produced a pioneering Mao Ze-dong’s philosophy and the great socialist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must be incubating a new philosophy. Starting with Mao Ze-dong’s philosophy should be the logic and method of construc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so that it can realize the important task of guid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hang Gai-xiang)

Constructing a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undamental Experie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The period between 1949 and 1956, the Early days of the PRC, witnesse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three fundamental experience of the CPC’s constructing a mainstream ideology. Fundamental experience includes the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studying and publicizing Marxism, systematically criticizing various non- or anti- Marxism ideologies in the old China and thoroughly removing their historical influence, and continually bring into full play the ideological function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ransforming the world so as to consolidate its dominanc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se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which constitutes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PRC and forms the source of ideological work method in social transition, boasts of its unfading charms and vital significance. (Wu Rong-jun)

An Updated Study of Overseas Researches on Left-Wing Thoughts: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s not only an age of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but also an age of the capitalist crisis of overall legitimacy from globalization. Although full of thorns, this era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rise of foreign leftw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the revival of the worldwide socialist mo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verseas left-wing, the rift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seems not to shrink, while it is commonly acknowledged to fight against and surpass capitalism. However, the left-wing in reality is still unable to summon up courage to embrace scientific socialism, even when capitalism is coming towards its dead e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overseas left-wing has the potential of revival, as radical ones among them raised the banner of “new commu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socialism continuously furthered in the global m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Zhang Jian)

American Marxism and Socialism in the Trump Era: A Review of the 2017 American Socialist Congress: July 6th, 2017 witnessed the convening of the American Socialist Conference in Chicago, another massive left-wing academic forum after the New York Left Forum sinc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Positive in consociating the north American left-wing and awak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conference is an academic event for left-wing scholars to research and disseminate Marxism, expose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and search for a socialist alternative.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dialectically evaluate the academic views of left-wing scholars in North America. The general assembly set up more than 100 thematic discussions with three main perspectives, namely Marxism a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capitalist institution and its crisis, multiple crises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faces, and the necessity of socialists’ establishing working-class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SA. (Zhang Lin-xin)

(翻译:张剑锋)

勘 误

关于《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路径和政策建议》(2016年第10期)一文勘误:

1、原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6][9]}(第24页文章第二部分的第五行到第九行)

更正为:我国《宪法》第八条规定,“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2、原文:《中华人民革命国共和国宪法》(第27页文章第四部分的第三行)。

更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原文:“前文提到的鲁家村是这种模式的一个典型。”(第27页文章第三部分最后一句)。

更正为:此句删除。